
凯恩斯主义的“复活”与 后金融危机时期的日本经济

张季风*

内容提要: 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几乎毫无例外地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应对危机。事实上,战后日本实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长期萧条期以及本次金融危机时期。实践证明,凯恩斯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刺激经济复苏,但与新自由主义一样有利有弊。最新经济数据表明,受强劲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刺激,日本经济已经触底,但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日本将面临严峻的疗伤任务。

关键词: 日本经济 凯恩斯主义 新自由主义 后金融危机

源自美国的此次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空前的冲击,不仅暴露了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致命弊端,同时也标志着西方推行的所谓新自由主义改革走到了尽头。在危机发生后,包括美国、日本、欧盟在内的发达经济体,以及“金砖四国”、东盟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实施了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凯恩斯主义大有全面复活之势。然而,在日本,这一举措与其说是凯恩斯主义的“复活”,倒不如说是凯恩斯主义的延续。事实上,日本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开始断断续续地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规模较大的有三次,分别是在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以后的长期萧条期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日本每次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复苏。2008年秋季以来,日本实施了战后最大规模的财政投资,并伴以减税和降息措施。目前,这一系列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溢出效果已初步显现,日本政府已于2009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年 6 月宣布经济“触底”企稳，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转为 3.7% 的正增长。而且可以预计，本次扩大有效需求的政策，对后金融危机时期的日本经济也将产生重大影响。

一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凯恩斯主义集中体现于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出版于 1936 年）。该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赤字财政、刺激经济、维持繁荣。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以及后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调节经济稳定发展。凯恩斯主义学派却认为，自由经济本来就不稳定，会时常出现供给过剩和长期萧条。凯恩斯发表《通论》时，正值 1929 年经济大危机之后，市场萧条、失业人口随处可见，更验证了这一点。凯恩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慢性萧条和大量失业的现象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所致。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进行干预不可或缺，其具体手段就是进行总需求管理，扩大财政支出、加强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被称为“景气稳定政策”。^①

下面以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日本施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为例，用图示简要解析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在图 1 中，横轴为国民收入（Y），纵轴为消费（C）和投资（I），45 度线表示国民收入与消费—投资之和（C+I）相一致的均衡水平。先看 A 点。A 点为消费线（C）与 45 度线相交的点。在此情况下，理论上假定储蓄、投资均为零，那么消费与国民收入相一致。再看 B 点。假定在消费水平线上投入 70 万亿日元（大体相当于日本 1984 财年的民间投资（含净出口））的投资，此线（C+I）与 45 度线相交于 B 点。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上均衡国民收入仅为 250 万亿日元，而实际上 1984 年度日本的 GDP 为 300 万亿日元，亦即 300 万亿日元为实际均衡国民收入。这样就出现了 50 万亿日元的缺口，借用凯恩斯的话来说，亦即出现了 50 万亿日元的有效需求

^① 参见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2002 年。

不足或“通货紧缩缺口”^①。按照凯恩斯的理论，为了填补这 50 万亿日元的缺口而达到均衡点 E，就需要增加 20 万亿日元的公共投资（G）。20 万亿日元公共投资的乘数效应倍数约为 2.5 倍，恰好填补了 50 万亿日元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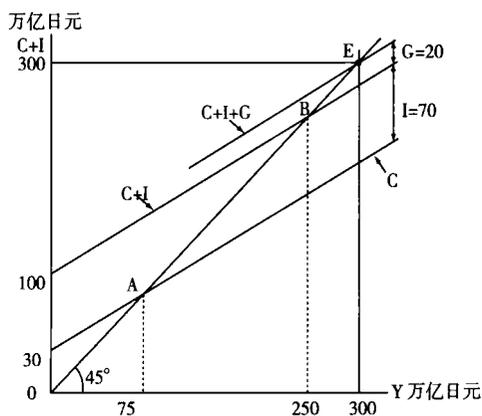


图 1 有效需求理论示意图

资料来源：三橋規宏·内田茂男·池田吉紀『ゼミナール日本經濟入門（改訂版）』、122 頁。

当经济出现萧条时，除了扩大财政支出和减税外，凯恩斯主义政策还要求央行实施降息等宽松金融政策予以配合。凯恩斯的这一“有效需求理论”被后来的凯恩斯主义学派经济学家不断完善，并形成了宏观经济学。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J. R. 希克斯就于 1937 年在《经济学人》上发表了题为《凯恩斯氏与古典派》的论文，首次使用“IS-LM 曲线”对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归纳，使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更加完善。之后，从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至 70 年代初，以增加财政支出、减税和降息等手段即扩大有效需求来刺激经济繁荣为特征的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经济学思想，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从而获得了高速增长，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

但是，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通货膨胀逐渐严重，特别是两次石油危机，更凸显了经济发达国家出现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的“滞

^① 三橋規宏·内田茂男·池田吉紀『ゼミナール日本經濟入門（改訂版）』、日本經濟新聞出版社、2008 年、123 頁。

胀”现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能充分解释这种变化，凯恩斯主义开出的处方也不再奏效。于是，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经济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崛起。这些学派几乎具有共同的特征，并与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大相径庭。(1) 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市场机制本来就不是“稳定的”，“不均衡”是市场的常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认为，应该把市场机制理解为不仅从微观上而且从宏观上来看都是供需平衡的。(2) 凯恩斯主义学派把政府对市场经济的积极干预予以正当化，认可“大政府”；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则主张把政府的作用限于提供公共事业等，尽可能建成“小政府”。(3) 凯恩斯主义学派主张通过政府的财政金融扩张政策来实施有效需求管理政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则认为这样做在短期内反而会阻碍市场机制所具有的自动稳定化功能，也不会有任何长期性效果，主张制定基于一定“规则”的政策。

在这种经济思潮的影响下，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英国、美国以及日本等相继进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革，试图摆脱由于长期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所致财政状况恶化的窘境。通过改革，这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被注入了活力，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困难，但也出现了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以日本为例，由于进行所谓“小泉结构改革”，结果导致日本的区域差距、社会差距以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而在美国，由于实行放松规制政策，政府疏于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导致金融衍生产品泛滥，最终引爆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并对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的打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主义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复活。

二 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日本实施的凯恩斯主义政策

以 1965 年为界，此前，日本在法律上严格限制发行赤字国债；1965 年日本陷入“昭和四十年萧条”，为了使经济摆脱困境，佐藤荣作政府提出实行凯恩斯主义赤字财政政策，并首次发行赤字国债，同时实施减税政策。从此，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由设备投资主导型转向国家财政主导型。凯恩斯主义政策虽然在当时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从规模还是深度来看，都无法与之后实行的几次凯恩斯主义政策相提并论。如前所述，除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日本政府还分别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和90年代长期萧条期大规模实施了凯恩斯主义政策。

(一)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日本扩大内需政策

1. 主要政策。

石油危机以后,当美国和欧洲各国还在“滞胀”泥潭中苦苦挣扎时,日本经济率先从萧条中走出,一枝独秀。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日本在70年代后期出现了“急风暴雨”式的对外出口,导致对外贸易不平衡加剧,日美贸易摩擦升级。1985年9月“广场协议”后,日元被迫升值,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1985年的238日元升至1986年的168日元,升幅达29.4%,1988年更进一步升至128日元。^①为了克服贸易不平衡、缓解日美贸易摩擦、摆脱日元升值萧条,日本开始推行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

1985年10月15日,即“广场协议”的一个月后,日本政府迅速做出反应,发表了《关于扩大内需的对策》,投资总规模达3.1万亿日元。1986年4月7日,日本政府发表了扩大内需和调整产业结构的纲领性文件——“前川报告”。该报告的第一个政策建议就是扩大内需,主要包括:(1)推动住宅对策及城市再开发事业;(2)充实消费生活;(3)推进地方主导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1987年5月29日,日本政府又提出事业规模总额高达6万亿日元的紧急经济对策,包括追加公共事业建设、减税和增加以扩大进口为目的的政府采购等措施以扩大内需。^②

2. 政策效果与教训。

1985年以来日本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居民消费和住宅投资等日渐坚挺的国内民间需求的支撑下,日本经济迅速从“日元升值萧条”中摆脱出来,1987年即转入高涨期,民间企业部门的生产效益开始回升,设备投资也得到恢复。而且,通过向“内需主导型”增长的转换,日本的国际经常收支顺差开始减少。1987年,日本经济增长率超过3.5%的预测目标,达到3.7%,经济企划厅和日本银行也于1987年7月正式宣布“景气复苏”。

遗憾的是,由于过度采取扩大内需政策,特别是长时间放松银根等政策的失误,最终导致日本经济显著过热。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① 内閣府『年次経済財政報告—改革なくして成長なし—』2003年版、422頁。

② 内山清『内需拡大をどのようにして実現するか』、総合研究開発機構、1986年。

保持低水平不变（1986—1988 年分别为 0.6%、0.1% 和 0.7%）的情况下，资产价格却急剧上升，特别是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爆。日经平均股指由 1985 年 12 月的 12977 点升至 1989 年 12 月的 38130 点，上涨近两倍。1986—1990 年，日本全国商业用地平均价格累计上涨 67.4%，其中三大城市圈平均地价累计上涨近 1.2 倍，而在首都东京，由于人们对东京将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预期，东京的地价与不动产价格更是进入飙升状态。股票、土地等资产价格的异常上升，明显脱离实体经济并超出其实际价值。在这种情况下，1989 年日本银行采取急刹车措施，多次大幅度提高利率，导致过热经济“硬着陆”。1990 年初，股市开始回落。1991 年，地价也开始下降。到 1992 年 8 月，日本股市降至 14300 点，仅为高峰期的 40%，而地价则一直走低，直到 2005 年才开始有所恢复。由于资产价格的缩水，到 2001 年，日本经济累计损失资产 1330 万亿日元。不仅如此，1991 年初夏，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留下了一系列难以治愈的后遗症，诸如不良资产庞大、投资信心崩溃、市场低迷、大批企业倒闭、失业率持续攀升和财政赤字扩大等等。这给日本经济社会造成巨大打击，导致经济陷入长期萧条，代价十分沉重。^①

（二）长期萧条期的日本扩大内需政策

1. 主要政策。

1992—2002 年，日本陷入长期慢性萧条。消费疲软、需求不足是这次萧条的重要特征，扩大内需自然成为挣脱萧条的重要一环。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主要采取了扩大公共事业投资、大幅度减税和发放“地区振兴券”等政策，同时还实施了史无前例的零利率政策和数量宽松货币政策。

扩大公共事业投资是日本在长期萧条初期和中期采取的最主要的刺激经济复苏政策。1992—2002 年期间，日本政府共实行了 11 次大规模“紧急经济对策”，其中 1998 年 11 月的那一次投资规模最大，总事业规模高达 24 万亿日元，其中财政投资达 8.1 万亿日元，预计可使 GDP 增长提高 1.9 个百分点。为了使公共需求顺利向民间需求传导，1999 年 11 月日本政府又确定了总事业规模为 18 万亿日元的“经济新生对策”，其中

^① 参见张季风：《挣脱萧条：1990—2006 年的日本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13 页。

财政投资 6.8 万亿日元，预计一年以后将带来 GDP 增长率提高 1.6% 的效果。2000 年 11 月，日本政府又提出了总事业规模为 11 万亿日元（其中财政支出 3.85 万亿日元）的“为实现日本新生的经济对策”，重点为信息通讯相关产业、环境对策、老龄化社会对策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

大规模减税是从 1999 年度开始进行的。从所得税来看，实行 4 万亿日元的永久性减税，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含国税和地方税）从 65% 降到 50%；从法人税来看，总减税额达 2 万亿日元，实际税率降到与欧美相同的 40% 左右，使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大降低。此外，还进行了总额为 2 万亿日元的政策减税。从 1999 年到 2000 年 5 月，已经实施的减税总额就达 9 万亿日元。此外，减征继承税，使东京和大阪等大城市圈消费能力较强的有钱人得到优惠，对促进消费也意义重大。

日本政府还通过发放“地区振兴券”来直接刺激居民消费。这一措施在 1999 年度得以实施。具体来说，即以全国无收入的老人和 15 岁以下儿童共计 3500 万人为对象，向每人支付相当于 2 万日元的购物券，以鼓励民众消费。“地区振兴券”的发放，实际上与减税措施具有同样效果。据经济企划厅统计，这一措施的实施使居民消费额提高 0.1%。

2. 政策效果与教训。

人们通常认为，凯恩斯主义政策只对短期萧条有作用，对长期萧条作用不大，因此多数人都认为日本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并没有起到作用。笔者对这种观点不敢苟同。一些政策出台后，其效果往往会滞后一段时间，在长期萧条时期更是如此。假设没有如此巨大的不间断的公共投资，说不定日本的经济状况会更加恶化。从数据来看，截至 2000 年的十年间，日本的平均实际 GDP 增长率为 1.2%，其中公共投资平均增长率为 1.9%，远超过经济增长率，而同期民间设备投资的平均增长率为 -1.3%，可见这十年的经济发展是依靠公共投资支撑的。^①同时，日本银行配合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零利率政策和数量宽松货币政策，保障市场流动性充足，防止了经济的自由落体式下滑。加之“中国特需”带来的外需扩大，日本经济从 2002 年开始走出长期萧条，到 2007 年 11 月，平均实际 GDP 增长率超过 2%，实现了长达 69 个月的战后最长经济景气。

① 三橋規宏・内田茂男・池田吉紀『ゼミナール日本経済入門（改訂版）』、105 頁。

长期实施的扩大内需政策使日本摆脱了长期萧条，但此举留下的财政亏空恶果也成为日本难以医治的重症。由于大规模扩大公共投资，使日本政府的财政负担不断加重，导致财政濒临危机。到 2008 年度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长期债务余额达 860 万亿日元，与 GDP 之比达到 173%，是发达国家中最糟的。目前，用于还本付息的国债费高达一般预算支出的 23%，仅用于支付国债利息的费用就占财政预算的 12%。财政结构完全刚性化已危及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日本政府利用财政杠杆调节宏观经济的空间越来越小。这是一个沉痛教训。

三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凯恩斯主义政策

(一) 国际金融危机对日本经济的沉重打击

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对日本金融机构的直接冲击有限，但对实体经济的打击却十分沉重。2008 年第四季度日本实际 GDP 增长率骤降 13.1%，创战后以来的新低。2008 年度 GDP 增长率下降 3.5%^①，出现战后最严重的衰退，2009 年第一季度又下降 11.7%^②。（参见图 2）不仅如此，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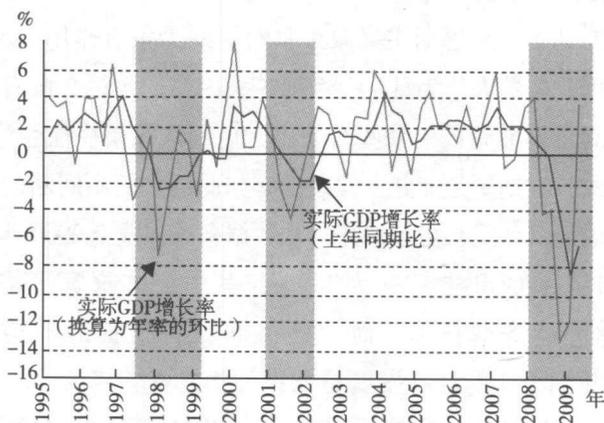


图 2 日本实际 GDP 增长率的变化

注：深色为景气衰退期。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新闻』2009 年 8 月 17 日、<http://www.nikkei.co.jp/keiki/gdp/>。

① 『日本经济新闻』2009 年 6 月 8 日。

② 『日本经济新闻』2009 年 8 月 17 日。

他主要经济指标也开始出现雪崩式下滑，其急剧之势战后少见。

特别是美欧市场萎缩导致日本出口迅速下降，2008年度出口同比减少16.4%，贸易顺差下降了90%，2009年第一季度出口又下降26%。此前日本之所以能从长期萧条中挣脱出来，主要是由出口扩大带动的。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日本的出口企业沉重一击，特别是汽车企业首当其冲，受害最重。出口产业受挫，引起工矿业生产迅速减少、设备投资下滑、企业经营恶化，企业效益的下降又引起就业形势的恶化，经济危机的特征十分明显。这说明在日本并未发生金融危机，而是发生了经济危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经济急剧下滑，且比震源地美国以及其他欧洲主要发达国家更严重，可以说这是金融危机与日本经济自身循环周期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经济周期的影响。战后日本第14次景气循环在2007年11月达到高峰，长达69个月的长期景气宣告结束。在国际油价上涨和经济循环周期的作用下，从2008年初开始，日本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就已经逐渐出现小幅下滑。即使不发生金融危机，日本经济也将进入衰退，只不过程度要弱一些而已。

第二，经济的长期萧条并未完全恢复。此前的景气复苏，虽然持续时间很长，但势头很弱。虽然企业生产得到恢复、效益有所回升，却没有惠及百姓生活，没有“实感”。而且在这次长期景气过程中，零利率政策并没有得到实质性解除，财政状况恶化的局面也几乎没有实质性改善。

第三，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强烈冲击。如前所述，北美、欧洲经济的衰退对日本出口产业以沉重打击，日本整个实体经济也遭连锁冲击。严重依赖外需的经济结构是日本经济遭受沉重打击的根本原因。

第四，政局长期混乱。自2006年10月以来，自民党与公明党联合政权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经济政策往往只服从于政治需要。从安倍晋三、福田康夫到麻生太郎，首相频繁更迭，经济政策缺乏连续性，特别是紧急经济对策出台后长时间得不到“扭曲国会”的通过，严重影响了日本经济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效应对。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日本经济是在旧伤尚未痊愈的情况下陷入新一轮的周期性衰退，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创，因此表现出比美国和欧洲主要发达国家更严重的症状。

(二) 政府的紧急对策与初步效果

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日本政府采取了空前规模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先后在 2008 年 8 月、10 月和 12 月采取了“紧急综合对策”、“生活对策”和“紧急经济对策”措施,被称为“三级火箭助推”。三次政策措施共投入财政资金 12.4 万亿日元,相当于同期 GDP 的 1.9%,预计将带动规模达 75 万亿日元的事业投资。三次经济对策主要包括支付定额消费补贴(2 万亿日元),下调高速公路收费,改善就业政策,住宅减税,实施医疗、护理、社会福利政策等措施。同时,为了加强金融系统的稳定,日本政府还出台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对策(政府提供担保规模扩大到 30 万亿日元),并增加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公共注资(12 万亿日元),成立银行等金融机构持有股票的回购机构等。

在货币政策方面,日本银行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向短期金融市场大量供给资金,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金融市场提供美元流动性,两次下调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的诱导目标(2008 年 10 月从 0.5% 下调至 0.3%,12 月再次下调至 0.1%)。2008 年 12 月,开始实施购入长期国债、购买一般企业商业票据等特别措施。直到 2009 年 6 月,日本银行一直维持 0.1% 的低利率,以继续增加货币的流动性。

鉴于 2008 年第四季度以来经济恶化速度加快,日本政府又于 2009 年 4 月决定出台新的“追加经济对策”,追加额高达 15.4 万亿日元,相当于 2008 财年 GDP 的 3%,是近年来最大规模的财政投资,预计将带动 56 万亿日元的事业投资,进而使 2009 财年 GDP 增长率提升两个百分点。

和第四次对策相比,前三次对策总事业规模 75 万亿日元中的 63 万亿日元被用于扩大政府金融机构的融资担保,而实际财政投资规模只有 12 万亿日元,小于第四次新对策。而且其中的投资内容也有所不同:前三次主要是以稳定国民生活和扩大消费为中心的“救急”政策,而新对策在继续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的同时,更多的投资项目将用于增加购买节能家电和环保节能汽车的补贴、加大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等新能源开发的支持力度等既可以带来扩大消费效果、又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

尽管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日本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但对其金融体系和社会结构并未造成太大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国家实力并未出现实质性变化。中央政府可利用财力仍然很大,这是日本实施大规模凯

恩斯主义政策的基础。正因为政策力度较大,日本的经济危机呈现出“来得快,去得也快”的特征。2009年5—7月,日本银行与日本政府双双连续三个月对经济运行做出上行判断。日本银行在6月份的《金融经济月报》中指出日本经济持续改善,7月的月报进一步指出经济逐渐好转。内阁府在6月份的《每月例行经济报告》中时隔七个月首次取消了“恶化”二字,认为经济已部分改善,虽然不能说复苏,但已触底。7月份的报告又进一步认为,尽管形势依然严峻,但经济已全面改善。第二季度实际GDP转为3.7%的正增长,进一步印证了日本经济已经“触底”。这也意味着日本经济已从危机阶段进入后金融危机的疗伤阶段。据预测,如果不实施经济对策,2009年度日本的实际GDP将为低于-5%的负增长,而实施经济对策后,将维持在-3%左右。可以说,上述一系列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已初见成效。2009年5月以来,日本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开始出现若干回暖迹象,特别是其中的节能汽车减税及绿色补贴、定额消费补贴等对策已产生效果。

四 后金融危机时期日本经济的走向 与凯恩斯主义后遗症的医治

(一) 近中期的日本经济展望

在空前规模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刺激下,日本经济已出现起色。但是由于日本经济的外需依存度较高,所以只要美国经济不复苏,世界经济不复苏,日本经济率先实现明显的V字型复苏很难想象,而出现扁U字型(即底部徘徊时间较长)复苏的可能性较大。由于美国经济、世界经济的恢复尚存悬念,加之经济下滑惯性等因素的影响,2009年度日本经济仍将表现为-3.3%左右的衰退。^①在此次经济衰退中,出口下降、生产减少、设备投资骤减、就业形势恶化以及个人消费减少等萧条特征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同时出现,来势凶猛;虽然触底也很快,但日本经济要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并继续走向复苏,尚需时日。

^① 『景気ウォッチャーGDPや月例経済報告など内外の主要経済指標』、<http://www.nikkei.co.jp/keiki/gdp/>。

从最近的情况来看,企业库存减少,2009 年 3 月库存已接近正常水平;生产逐步回升,4—6 月,工矿业生产指数高达 8.3%,与上季度的 -22.1% 形成鲜明对比。7 月下旬日经平均股指已恢复到 10000 点以上^①,企业信心指数得到提振。加之周期性衰退接近尾声^②,在强有力的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的刺激下,日本经济在 2009 年第二季度出现了环比 3.7% 的正增长。目前,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实现经济增长“保八”目标已无悬念,美国经济也出现复苏迹象,世界经济复苏的希望增大,在外需回暖的预期下,2010 年度日本经济可能转为 1% 左右的正增长。不过,即使经济回暖,失业状况仍将继续恶化,个人消费还将持续疲软。受金融危机影响,到 2009 年 3 月底,日本已有十几万“派遣临时工”失去工作岗位,正式员工也人人自危。从失业率看,2008 年 1 月仅为 3.8%,2009 年 1 月上升为 4.1%,6 月又攀升至 5.4%,逼近战后最高点。同时,有效求人倍率下降至 0.43,为战后最低,失业人口总数高达 348 万人。^③ 估计未来一段时间,失业率还将上升。失业人口大量增加,将抑制社会总收入增加,消费预期下挫,个人消费难以扩大。

从中期来看,日本经济仍然充满了挑战,前景不容乐观。这里的中期是指未来五年左右的时间,亦即后金融危机时期。这一时期是对金融危机后的遗留问题进行处理、治疗的阶段。由于设备投资低迷、失业压力增大、消费持续疲软、财政困难以及外需环境不稳定等不利条件的存在,日本经济很难出现较高增长,但陷入长期萧条的可能性亦不大。鉴于日本经济实力雄厚,特别是国内金融系统仍然稳定,经济基本层面尚好,企业资金雄厚、创新能力旺盛等因素,日本依然具备经济再生的基本条件。特别是在有望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的绿色经济、节能环保领域,日本具有压倒性优势,政府又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今后将实现进一步成长。而财政、社会保障以及少子老龄化等问题对近中期日本经济的影响

① 『景気ウォッチャーGDPや月例経済報告など内外の主要経済指標』、<http://www.nikkei.co.jp/keiki/kougyou/>。

② 从战后日本出现的前 13 次景气循环来看,衰退期平均为 17 个月。第 14 次景气循环从 2007 年 11 月开始进入衰退期,到 2009 年 7 月达 20 个月。

③ 同①, <http://www.nikkei.co.jp/keiki/shitugy/>。

有限。在美国经济、世界经济复苏的大前提下，后金融危机时期，日本经济有望保持1%—1.5%左右的稳定增长。

（二）后金融危机时期的疗伤任重道远

日本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危机，但也留下了难以医治的病症，而最大的后遗症莫过于财政赤字。如前所述，到2008年度末，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长期债务余额达860多万亿日元，与GDP之比达到173%。因此，经济回暖后，进行财政结构改革将是后金融危机时期日本经济的重头戏。

日本的财政状况陷入如此严重境地，是日本长期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财政赤字已变成结构性问题。继续放任其发展下去，将会对企业的资本积累造成负面影响。而且，沉重的财政债务终要由国民负担，国民的增税预期和不安心理加重，直接影响消费的扩大，也将制约宏观经济的发展。不过，客观地讲，前一时期，由于政府严格控制国债发行，每年都尽量缩小预算支出规模，日本的财政状况曾有所改善。国债发行额逐年减少，2005年度为31.3万亿日元，而2006年度降为27.5万亿日元，2007年度为25.4万亿日元，2008年度为25.3万亿日元，国债依存度从2004年的44%下降到2008年的32%。^① 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下降，2004年度为6.3%，2005年度降为5.2%，2007年度进一步降为5.0%。若照此发展，2011年日本实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基础财政平衡大有希望。遗憾的是，由于突遭金融危机袭击，日本政府不得不再次采取扩大国债发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使财政再陷深渊。

造成日本财政困难的另一个原因是入不敷出。以2008年度为例，其预算财政支出为83.6万亿日元，而税收仅有53.6万亿日元，存在30万亿日元的巨大缺口，只能依靠发行国债填充。所以，彻底解决财政赤字问题的最主要路径就是增加税收。2007年，日本国民的租税负担率为25.1%，社会保障负担率为15.0%，即国民负担率为40.1%，略高于美国，但远低于欧洲53%的平均水平。^② 也就是说，日本还有增税的空间。从长远看，提高消费税是解决税收减少的重要途径，然而提高消

① 矢野恒太記念会編集『日本国勢図会』、2008/2009、382—383頁。

② 同上书，第385頁。

费税又是最得罪选民的事情。1989 年竹下登因增设消费税而丢掉相印；1998 年桥本龙太郎因为将消费税从 3% 提高到 5% 而落马；就连“政治怪人”小泉也没敢踩消费税这个地雷，而是将之留给后任；安倍晋三和福田康夫还没等提及增加消费税就相继下台；直到麻生太郎上台，力排众议，最终确定如果 2011 年经济得以恢复就将增加消费税纳入议事日程。但是由于政局动荡，执政不足一年的麻生首相不得不提前解散国会，并决定在 8 月 30 日进行大选。据媒体预测，在野的民主党获胜可能性较大，倘若民主党执政，到 2011 年能否提高消费税又成为悬念。

就现状而言，经济回暖趋势若能得以持续，2010 年以后，日本将会逐步告别凯恩斯主义政策，重新走上财政结构改革之路。目前日本有关方面已明确表示，2010 年度的财政预算规模将小于上年度，国债发行额度也将相应缩小。但无论采取何种手段，日本要实现最终解决财政赤字的目标，恐怕还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

另外，择机再次解除零利率、使金融政策回归常态，也是后金融危机时期的重要任务。为克服长期萧条，日本于 1999 年 2 月开始实施史无前例的零利率政策，2000 年 8 月曾一度解除，2001 年 3 月再度实施，同时配以数量宽松货币政策。随着经济的复苏，2006 年 3 月，日本解除了数量宽松货币政策，同年 7 月又解除零利率政策。但是，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从 2008 年底起日本再次实施零利率政策，同时还采取回购国债和企业商业票据等非传统金融手段以扩大流动性。根据此前的经验判断，日本再次解除零利率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使货币政策再次步入正常轨道，估计至少要到 2011 年经济实现完全复苏以后。

综观战后日本不同时期实施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虽然都对刺激经济复苏产生了很大作用，但也留下了严重的祸根。凯恩斯主义政策是在经济危机时不得不实施的短期救急政策，当危机结束后，自然会转为紧缩政策。而且新自由主义在日本还颇有市场，一旦经济实现复苏，日本还将继续推行财政结构改革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缓解财政困难，使经济走向自律性增长。当然，将来如果再次发生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还将复活，待经济复苏后再回归紧缩政策。可以预见，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乃至更长的时期，日本恐怕都很难摆脱这种怪圈。

(责任编辑：李叶)

未来十年間の中日関係と中国の対日政策

—21世紀の中日関係に関する研究レポート—

蔣立峰

本稿では、まずは去る十年間の中日関係に評価を出し、歴史の経験と教訓を全面的に総括し、それに未来十年間の中日関係を展望した上で、中日関係の位置付け、政治と経済の関係、安全関係、金融危機の応対、中日の経済協力、中国のイメージという六項目から、中国の対日政策指向を詳しく分析し、相応の政策提言を出した。

「日華懇」及びその中日関係への影響について

王海濱 蔡 亮

1997年5月に、自民党の「日華関係議員懇談会」を主体としていた日本政界の「台湾ロビー」が再編され、日本国会における最大の超党派の「日華議員懇談会」（「日華懇」と略称）に改組された。「日華懇」は、「密室政治」、「親台を宗旨に」、「日台交流のパイプ」などという「日華関係議員懇談会」の特徴を引き継いだうえ、「超党派化」、「メンバーの新生代化」、「日台政治交流の多元化」などという新特徴も持っている。日本政界における「台湾ロビー」の代弁者としての「日華懇」は、国交樹立以来の中日関係の枠組みに反対しないとはいえ、「台湾をもって中国を制する」という方針が中日関係、中国兩岸関係の健全な発展に極めて悪影響を与えた。

ケインズ主義の復活とポスト金融

危機期の日本経済

張季風

2008年9月に国際金融危機が発生して以来、先進諸国も発展途上国も例外なくケインズ主義政策を利用して金融危機に対応した。戦後、日本では、1980年

代半ばごろ、長期不況期および今回の金融危機緊急対策など、三回ほどケインズ主義政策を発動した。経済実践によって証明されたように、ケインズ主義にも新自由主義にもメリットもあるが、致命的な欠陥もある。最近のデータから見れば、日本経済は次第に持ち直し、「底入れ」の可能性が高い。ポスト金融危機期では、日本経済は如何に傷を治すか、今後の動向はどうなるのかについて注目すべき、研究すべきであろう。

日本の技術進歩の弁証法

馮昭奎

技術進歩が経済成長を促すメカニズムと技術進歩そのものに内在するメカニズムは、経済理論のなかでも大いに関心を集めている課題であり、また経済研究者が倦まずに心血を注いで探求したがる課題でもある。本稿では、マルクス主義の歴史唯物主義と弁証唯物主義の基本原則を以って、1949年から1979年まで、すなわち戦後日本の工業化時期における技術進歩のプロセスとメカニズムについて分析を試み、工業化途中にある中国のために参考価値のある資料を些か提供したい。

金融危機下の日本のODA 戦略について

張 彤

2009年4月に、日本外務省から、対アジア、アフリカのODA大幅増額を中心とする「平成21年度国際協力重点方針」が発表された。それによると、対アジア、アフリカのODA目標金額はこれまでの最大規模となった。金融危機の影響により、開発援助委員会（DAC）加盟国ではみなODAの減額を行っている中、日本経済も手痛いダメージを受けたはず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日本政府だけが逆に政府開発援助（ODA）の増額計画を公表した。日本ODAの特徴と今回のODA増額の主要地域の分布を分析すれば、次の結論が得られよう。金融危機下のODA増額計画は、日本経済の復興を促し、その国際的な政治利益を拡大するという戦略的な目的にある。但し、長い目で且つ歴史的な視点から見れば、国内経済低迷と外部経済環境の悪化の影響により、日本のODAの純支出が減少されることは必至である。したがって、日本はODAの質の改善、ODAの効率アップに力を注ぐことになろう。また、日本はODA「責任分担」の理念を堅持し、世界的な問題の解決に積極的にかかわっていくであろう。